

难忘的历程(二)

五、护“烟”战斗

神山战斗后,部队回到五字湾,经过短期整训后,即开往沙圪堵驻防。部队重新进行整编,我调到司令部直属队,担任指导员,贺明明任队长。直属队起初只有三十来个人,后来很快扩充为一个连。直属队活动在暖水和准达旗交界处,忽而东忽而西打游击,一面还侦察东胜和达旗的敌情,就这样我们以沙圪堵为据点,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度过了一九四八年的夏秋季。

一九四八年秋后,司令部直属队改编为准达游击队,驻地由沙圪堵迁到纳林。这时,由柴占元任队长,我继续任指导员。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郝文广和杨达赖同志,开辟达旗方面的工作;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保护老乡种洋烟,与白区进行贸易往来,解决部队及解放区的经济来源问题。正当盛夏时节,大烟成熟开刀取奶的时候,各路土匪官军像饿狗一样出来刁抢。我们顶进行“武装护烟”。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日夜追袭敌人,忙得吃不上饭,睡不成觉,时间长了衣服上的虱子也成了蛋蛋儿。

一天,我们正准备吃中饭,一位老乡突然跑来报告:“附近来了几十个土匪兵,把老乡们取下的洋烟全部抢走了。”我们当即去追击,狡猾的敌人听见我们去了,暗暗地隐藏在一片麻林子里,向我们偷袭,使我们受到一定损失。王二保、张汉清等三人受伤,伤亡和丢失战马四匹。我们打死敌人两名,活捉一名。这股土匪让我们一窝子追到达旗的牧场境内。

有一次,我们跟准旗代理旗长白凤岐下去征烟税。正准备吃晚饭时,忽然探子回来报告:“达旗伪军康明仲一个团的人马开向这里来。”二大队的通讯员也送来了“十万火急”的报告,让我游击队火速向昌汉救包靠拢,准备围歼“糠皮子”匪军。情况万分紧急,按照白旗长的意见,让战士及战马吃饱喝足,立即奔向昌汉救包。由于夜晚行军,走走停停,结果迟到了一个钟头。赶到昌汉救包时天已破晓,二大队已先到了那里。由于情况不明,他们误把我们当作摸后路的匪军,不容分说就朝我们开枪。当误会闹清后,敌军康明仲和王在成一个团的兵力也赶来。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日落西山,黄昏时分,敌人败退逃走。这次战斗没有全歼“糠团”,又误伤了自己的一些人马,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

六、围歼“组训处”

一九四九年正月,高司令亲自带领我们西进达旗,攻打耳字壕组训处。

迎着晚霞,我们从沙圪堵出发,连续行军二百余里,清晨到了耳字壕以东的城塔、康家湾,捉住了王在成派来参加灯游会的二十多个伪兵。我们了解了组训处的敌情,在第三天午前响到了耳字壕。

耳字壕四面环山,壕里住着二十多户人家,包东公路从中穿过。组训处土围子就设在壕北山头上紧靠公路的地方。我主力部队登上壕东一个山头,担任主攻。我带一部分队伍,守住壕南路口边上的一个山头,堵击东胜方面的援军,防止敌人南逃。

战斗从上午打响,不到中午就宣告结束,可以说是速战速决。敌人除被击毙的外,大部分向西逃窜。我们捉住三十多个俘虏,其中一个青年叫康来子,经过整训表现不错,给我当了通讯员。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家伙是康明仲的侄子。一天,我们部队出发剿敌,康来子装病请了假,暗中勾结附近一个叫樊四才的,趁我们不防备,两人各偷了一长一短的枪,骑了两匹马,投奔康明仲而去。过了不久,樊四才因为康明仲向他索要马和短枪而后悔不及,又骑马带枪返回了部队。康来子却死心踏地追随康匪,解放后被捉拿归案,被人民政府处决。

七、勇追敌寇

解决了组训处后,部队乘胜前进,当天下午就出发去解放东胜,二月的夜晚冷风刺骨,我们埋伏在城东的山坡上,熬过了漫长的一个多小时后,忽见城头燃起了火苗,这是先遣队发出的信号,我们以百米跑的速度进了城里,顺利地解放了东胜城。我们开仓发粮救济贫民,计划四天上回准格尔召。

正当我们开仓救济贫民,准备返回准旗的时候,第四日凌晨,忽听城外传来枪声,并且打伤我方一个哨兵。经我们猛烈还击,敌人夹起尾巴逃跑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捣乱、失败是他们的必然下场。高平副司令立即下了动员令,挥军西下,彻底歼灭残余匪徒。敌人企图我们追到东胜城五十多里外的李飞寨寨子,他们企图凭借这个山寨负隅顽抗。我们包围了寨子,连续作战,在我们强大的火力和政治攻势之下,敌人终于在城头插起了白旗。这次战斗共俘虏

敌人一百余名,捉住了匪团长张金魁、大队长杨文煨。我们打扫了战场,带上俘虏和战利品凯旋而归。这时夕阳西下,晚霞扯起了玫瑰色的天幕,映红了我们脚下的山路。

一九四八年冬天,副司令员高平、政委高增培等,率领我们骑兵部队西征达拉特旗,扫除沿滩一带的土匪。部队从新民堡往西走,沿途扫了一些区、乡公所,来到小淖儿住下。盘距在大树湾以西的敌人向我们发起了挑衅,当即遭到我们的回击。敌人见势不妙,一部分慌忙逃窜到西南十余里处的王银洞寨子里,其余骑兵向大西滩逃窜了。部队命令我和十几名战士去追击西逃的残匪,其余集中火力围歼龟缩在寨子中的顽敌。一场围歼战开始了,土围子四面平坦,对我们正面攻击极为不利。顽匪在炮楼上居高临下,雨点般地向我们扫射,部队被敌人的火力压住难以前进。战士们义愤填膺,没等高司令员下命令,就发起了攻城冲锋。土围子里实际仅有二十多个残匪,在我方强大的攻势面前,趁天黑下来,挖开城墙逃跑了,匪团副魏广林被俘。这次战斗我们付出的代价较大,牺牲了排长张同汉等八、九个战友。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把烈士掩埋在同心公的一块墓地。部队接着撤回准旗纳林驻防。

不久传来了绥远和平起义的消息,上级指示,我骑兵部队准备接管达拉特旗。此时,绥远虽已和平解放,但仍处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混乱阶段。我们面临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达旗旧政府派原八参令秦玉祥专程到纳林来接我们,一九五〇年正月初四,我带领三十余名骑兵从纳林出发来到达旗。接着紧张地开始了组建新政权的工作。进驻了汪鹏程的王府邸,接管了慕幼声的组训处,组成了郝文广任书记兼政委,杨达赖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杨培森任公安局长的新政权领导班子。在新政权的领导下,我们大张旗鼓地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废保建政、减租反霸、剿匪肃特等一系列斗争。从此,达拉特旗蒙汉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全文摘自《继往开来》)

红色历史 红色故事

文革运动开始后,把人们集中了起来,首先是开会,然后是批判。这样,在上面下来工作组的压力下,村子里出身不好的和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被立为批判的对象,而周老汉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自然就是受审查的人。没过多久,工作组的人带着村里的几个“红人”,抄了他住的饲养房,把抄出的十几本小说和十几本连环画扔进灶台的干柴中,全部烧成了灰烬,并且当场批判他是封建社会的代言人,狗胆包天宣扬剥削阶级思想。此后,生产队的批判会接连不断,周老汉成了被专政的对象,而批判的形式渐渐地变成了肉体的折磨,他没有忍受下来,一天夜里,趁看管的人睡熟了,悄悄地逃了出来,孤单凄凉地朝着他永恒自由的地方走了。第二天看管的人发现他不在家,报告了工作组,于是工作组打发人到北面的黄河边寻找,大寻了几天没有找到。从此村子里失去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失去了一位开启思想的先师。

光阴荏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苍山易老人易老”,如果给鬓髯已染只能看晚霞了,倒不如说新时代新农村给我情怀中留存的黑白影像图上了一层焕然的色彩。

今年春天,我自驾车带着家人回到了离开多年的故地,一进村子,就看到一座整齐划一的白墙灰瓦房,古色古香,像走进了山西的民宅村落。此行自然要去昔日的饲养院看看,当我走到原来的地方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栋漂亮的房舍,这是村子里的文化活动中心,活动室内有阅览室、棋牌室和台球室。活动室外,是一个小广场,旁边安着一排崭新的健身活动器材。

此时我在浮想,仿佛我爬上了一座高山,不敢向后看,然而在我的脚下,却和许许多多的人走在了一条平坦的大道上——因为,贫困变成了富裕,破旧变成了美丽,萎靡变成了精神,忍受变成了享受,惆怅变成了喜悦,束缚变成了自由。这种情景渗透在我的思想中,难道说我会还老吗?

故乡的饲养院

冯旭东

有人说人生最难忘的、记忆最深的是童年经历的那些事。在我的童年,印在脑子里最深刻的就是生产队的饲养院,在那经济和文化最贫乏的年代启蒙了我稚幼的思想。

上世纪农村大集体的时候,村子里二十多户人家划成了一个生产小队,这样为了安排生产和管理好集体财产,生产队用土坯盖起了一排队房,按照用途分为:社员开会的队房,加工粮食的碾房、存放生产工具和粮食的库房,除此还有饲养大小牲畜的饲养房。其中以饲养房为主,需要常年住人,每天傍晚都要喂养牵回来的和入圈的大小畜,同时还要看管库房,因此人们习惯地称这一排队房叫“饲养院”。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生产队派了一名四十多岁的光棍老汉,村子里大人们叫他周瞎子,孩子们叫他周大爷。

周老汉是河北保定人,据他给村里人说,娃娃时念过两年私塾,民国二十八年他二十岁时,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壮丁,当时日本军队步步紧逼,他们不敢抵抗,部队撤到了西山咀。一天夜里,排长让他在山坡上放哨,到了半夜时分,突然听到山坡下有狼嚎的声音,吓得他往后一退掉进了沟里,还好保住了命,可一条大腿却摔成了粉碎性骨折,那年代没有好医药治疗,后来骨头虽然长住了却成了瘸子。部队嫌他累赘,给了他两块大洋把他打发了。他离开部队打算回老家,可路费盘缠不够,只好流落在黄河沿岸,一边给人家打工,一边打听老家的事。后来偶然碰到同乡逃难的人,才知道家里的双亲长住了却成了瘸子。在临近解放的前两年,他来到了本村,给村里的陈寡妇家种地,时间长了,陈寡妇看他老实,自愿把他入赘为丈夫,解放后不久,他帮助陈寡妇给前家儿子娶了媳妇。正在建合作社

的时候,陈寡妇突然得了急病去世,以后他再没有成家,一直是光棍。

周老汉负责饲养院的差事后,人勤俭又实在,他给生产队喂猪的大小畜,牛马驴骡拉犁套车使唤起来很有劲,喂养的一口母猪每年能产两窝仔,同时每年还能喂一两口肉猪。另外,每天晚上羊圈把生产队的羊群赶回圈里后,就由他喂羊、看管和接羔,每年冬天接羔全部都能够成活,生产队人人夸他是好饲养员。他当饲养员更为人们欣喜的是每年到了农历七月十五和八月十五的时候,生产队除了完成国家下派的收购牲畜任务后,社员按人头每人能分到半斤猪肉,如果杀羊,每人能分到一斤肉。他看管库房里存放的粮食从来没有丢失过,所以生产队饲养院的差事一直没有换人。

周老汉为人和善又好拉呱,平时爱看书,在村子里还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人们一有闲空就簇在了饲养院,听他说些古时候的故事,村里的人土话就叫“叨书”。我听过他讲过《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他都是整本说下来的。后来我参加工作通篇看了这几本书,回想他讲的书里人物情景,都能与每本书的章节对上。那时候,周老汉讲故事吸引了许多人,也许这是人们最好的精神享受吧,每天晚上他住的饲养院坐满了大人娃娃,我是“故事会”的常客,他一开讲,整个屋子鸦雀无声。就是听周老汉叨书,让我入了迷,每天一有空就跑到饲养院,为听他叨书,帮他做些轻便的营生,提几桶水或抱几捆草。也许我这不起眼的付出,他是满意的,一天,他悄悄地对我说:“我这里存放着一些古书,别人都不知道,人们说这些书都是毒草,我看这些书还是有用的,你念书娃娃不懂这些不行呀。”说完,他从箱子里拿出两本连环画,递给我:“带回家自己去看吧,不要让别人看见,看完再来换没看过的。”我接过他借给我的书,回家后,在自家草垛搭了一个简易窝棚,藏在里面,如痴如醉地翻阅着连环画。就这样,我隔三差五去饲养院还书借书,然而好景不长,农村的文革开始了,一时政治充斥了人们的头脑,让一些人紧张了起来。